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述論

Mainland China's Conferences in the 1990s o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P. 14 - 24

陳 友 冰 (Chen Youbing)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

An Hui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壹●前言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此時的唐代文學研究，隨著國門的打開和思想的解放，無論在學術機構的建立、學術活動的開展，學術刊物的發行，研究範圍的拓展以及學術思想、研究手段的更新，與38年相比，都呈現一種飛速變化和極為活躍的態勢。但在經過十年多的活躍新變後，到了九十年代，唐代文學研究從研究的視野、角度到研究者的氣質、心態，乃至研究者生存的環境、社會對此的關注程度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要言之，即由外在的風起濤湧進入了深沉內斂的沉思縱深階段。如果要用發展曲線加以描述，從1990到2000年這十年唐代文學研究基本上呈馬鞍型：

八十年代末到1991年是個活躍期。這個時期挾八十年代中、後期火爆之勢，各種學會和研究會紛紛成立、活動頻繁。唐代文學研究的著作和論文數量也較多，如1990年出專著73種，發表論文910篇；1991年專著59種，論文873篇，明顯高於整個九十年代專著51種、論文749篇這個平均數。¹

1992到1995年是個低潮期。出版市場萎縮，學術刊物減少、發行量減少，著作和論文的數量明顯遞減。

據統計，1992年發表論文498篇，1993年論文575篇，兩年專著68種；1994年專著33種，論文863篇；1995年專著21種，論文768篇。學會的活動節奏放慢，研究的成立漸次消歇。

1996年到本世紀結束是復振期。呈現的狀況更為複雜，從著作和論文的數量來說有大幅度的增加：1996年專著85種，論文801篇；1997年專著70種，論文703篇；1998年專著69種，1999年專著64種，2000年72種。但由於商品大潮的衝擊，部分研究人員開始趨時，不願意再做那種既消耗時間又費力氣的輯佚、筆注、考辨之類基礎性扎實功夫，出版界中有些人乾脆把不存在版權和稿費的古本拿來重排或直接影印出版；第二出版渠首的盜版之風更加盛行；為了迎合公款消費，編大型的「集成」、「大全」、「大觀」之類的叢書越來越成為時尚，而且分類的名目越來越花樣翻新。但值得慶幸的是，面對商品大潮的巨大衝擊，古代文學研究普遍疲軟的態勢，中國學者的傳統品格又一次迸發出絢爛的火花，他們中的一部分堅韌者又一次在固守和堅持，但不同於五、六十年代那種政治壓力下的學術品格及至人格的固守和抗爭，相反卻是在政治寬鬆，自由度、選擇性加大的情況下，人生追求上的自持和把握。「千淘萬漉總辛苦，狂沙吹盡始見金」，正是這種執著的自持和把握，使九十年代的大陸唐代文學研究，成為繁華搖落後的虬勁，百川匯聚後的深沉。

1 九十年代唐代文學著作論文統計參用張明非〈九十年代以來唐代文學研究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9。



貳●研究成果

九十年代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集中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文獻資料的輯佚整理、索引編目方面

文獻資料的輯佚整理、索引編目與八十年代相比，持續的時間更長，有時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因而更帶有總結性質，更加大型化、系統化。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已經過了十年多的努力，目前仍在進行之中。已經出版的曾昭岷、王兆鵬等人的《全唐五代詞》也經過了近十年的時間。從整理的範圍來看，已遍及詩歌、小說、散文、詞曲、筆記等各種體裁，總集、資料匯編、辭典索引、補編補遺、集解匯解、地理方志等各種門類，而且大型、全面、系統，更帶有學術總結的性質。如唐人小說方面資料總集有王汝壽的《全唐小說》（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6），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下）（南開大出版社 1998），方積雲、吳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華書局 1992），中華書局還於 1994 年推出一套《歷代史料筆記叢書》，其中有唐人筆記《明皇雜錄》、《東觀奏記》、《隋唐嘉話》、《朝野僉載》、《大唐新語》六種。詩文總集方面有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 1992），吳綱《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5），周祖謨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 1991），張忠綱主編《大唐詩大辭典》（語文出版社 2000），陳抗、林淪等人的《全唐詩索引》（高適卷，李商隱卷，劉禹錫卷，杜牧卷，王維卷，韓愈卷，岑參卷，孟浩然卷，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卷）（中華書局 1994）。詩文別集方面有裴斐的《李白資料匯編》（中華書局 1994），吳企明的《李賀資料匯編》（中華書局 1994）等。文史地理有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隋唐五代》（北京師範出版社 1993），郁賢皓《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中華書局 1994），周勛初有《唐人佚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 1992），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2），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等。

九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不僅更帶有學術總結的性質，而整理匯編的對象也更加具體、更加專門化，既有像《新編全唐詩》、《新編全唐五代詞》那種的總體性的匯編，更多的細分為唐詩評論方面、佚事方面的、筆記小說人名方面的，乃至小說中志怪傳奇類別的類編。另外，搜羅的資料更加豐富、更全面，整理、剔除也更加精嚴。如周勛初的《唐人轉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收集唐五代歷史人物近 2700 人，共 170 餘萬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近 300 種，是到目前為止搜羅最富、規模最大、體例最精的一部唐五代人物資料庫。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費時十年，成書 100 卷，收作品 1313 篇（另有外編 25 卷，作品 801 篇）且逐篇有考證、校勘。不但網羅了現有的各種單篇和成集的唐五代小說，而且還遍檢諸家別集、文章總集、叢書類書、佛藏道藏、稗史地書、敦煌遺書。

二、別集的疏證、箋校、編年、考論方面

別集的疏證、箋校、編年、考論由於出於艱難而出現了一批精品。中國有句古老的格言叫「艱難困苦，玉成於汝」，很能說明大陸九十年代唐人別集研究情形。由於研究經費的短缺和出版業的價值取向，研究者不願選擇這類課題，出版業也不願做這類出版品。所以一旦出版，總有其獨到之處，一般說來都是精品，而且比起八十年代的同類出版物，積蓄的時間更久，資料的收集更為豐厚。以錢學烈的《寒山拾得詩校評》為例，八十年代初，作者的碩士論文即是《寒山詩語言研究》，自 1983 年起，陸續發表《寒山子與寒山詩版本》等論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詩校注》交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雖屬填補空白之作，但疏漏錯處不少。作者從 1993 年起開始對該書進行補正，並利用出國講學之機，搜集了港、臺、日、韓等等一批海外資料，1996 年和 1997 年又兩次去浙東天臺山寒山故地考察。1998 年出版的《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可以說是著者近二十年寒山研究成果的一個集結，比起八十年代的《寒山詩校注》，更精當一些，也更豐厚一些。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收集作者八十年代以來有關唐代文學的考辨文章 23 篇。其

中的《全唐詩誤收考》考出誤收入《全唐詩》的唐以前和宋及宋以後的詩作 782 首，詩句 53 句，詞 34 首，涉及作者 115 人，引書達 300 種以上。其《唐人編選詩歌總集目錄》，共考出唐人所編選的詩歌書籍 137 種，比今人所論及的多出 80 多種，而且提供了大量今人未曾注意的材料。類似的疏證、箋校、編年、考論還有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6），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陳克明的《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巴蜀書社 1999），羅時進《丁卯集箋證》（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傅義《鄭谷詩編年校注》（華東師大出版社 1993），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 1993），劉衍《李賀詩校箋證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4），祝尚書《盧照鄰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劉開揚《吟參詩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 1995），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6），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中華書局 1996），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中華書局 1997，詹鍈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7），錢仲聯、馬茂元《韓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張湧泉、黃徵《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 1997），周紹良等《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 1996），閻文儒、閻萬鈞《兩京城坊補考》（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韓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 1995），陳國燦、劉健明《全唐文職官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7），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6）等。

三、專論、通論的論著方面

專論和通論方面的論著與八十年代相比，一是專論更加精深，更多新見，在標新之際也有著更深層的思考。如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是繼作者和余恕誠合作的《李商隱》、《李商隱詩選》、《李商隱詩歌集解》

之後獨立完成的一部專著。全書分為〈本體篇〉、〈源流篇〉、〈研究史篇〉、〈考辨篇〉、〈余論篇〉五大部分，涉及到對李詩的本體、源流研究（內中又有與樊南文的交叉研究）、李商隱詩歌研究史和行年考辨，可謂博大精深。既動用了作者在二十多年來李商隱研究中的豐富積累，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如專著的最後一部分，作者稱作《余論》，僅 17,000 多字，卻彌足珍貴。它討論是研究者們尚未涉及的李商隱詩歌接受史，而且力圖從這一新的角度來解決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以及歷來人們對此的歧見。作者打算「結合在編撰《李商隱詩歌集解》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對這類詩特徵的認識，來說明這類歧解何以產生以及為什麼能夠加以融通」。²

二是論通涉獵的範圍更廣，更多了一些文學史海的鉤沉和思考方式上的創新。蔣寅《大歷詩人研究》以其碩士論文「戴叔倫研究」和博士論文「大歷詩風」為基礎拓展加深而成。作者以地域文化和詩人群體為切入點，對劉長卿、「十才子」、皎然、吳筠等三十多位大歷詩人的家世、生平、創作道路和文學風格的形成、流變，一一作了考索和析論。其新見迭出，像包佶、陸羽等人的生平創作考證都是填補空白的開創性之作，不僅在唐詩研究史上有很大意義，對中國財政史、茶葉史、經濟史研究也是貢獻多多。程國賦的《唐代小說嬗變研究》以一個時代、眾多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嬗變規律，有目的地去揭示某些帶普遍性的結論。對其嬗變規律，作者從題材、體裁縱橫兩方面進行了探討。題材上分為神怪、婚戀、逸事、佛道、俠義五大類別分別探討其嬗變規律。

專論和通論方面代表性的專著還有：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 1993），鮑明煒《唐代詩文韻部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陳鐵民《王維新論》（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0），張錫厚《敦煌本唐集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98），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胡先可《杜牧研究叢稿》（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2），詹幼馨《南唐二主詞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3），李華珍、傅璇琮《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 1993），王拾遺《元稹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4），余正松《高適研究》（巴蜀書社 1994），朱金

2.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204。



城、朱易安《李白的價值重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5), 蕭瑞峰《劉禹錫詩論》(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卞孝萱的《劉禹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丁鼎《牛李黨爭研究》(遼海出版社 1998) 等。

四、唐代文學研究方面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趨向是朝橫向拓展和縱向深入。所謂橫向拓展一方面是指研究範圍不斷擴大, 在對象研究上, 除了李白、杜甫、王維、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等大家繼續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外, 中小作家研究也普遍展開, 還專門召開過張九齡、駱賓王、陳子昂、胡曾等人的研討會。李百藥、李治、郭元振、權德輿、玄奘、綦毋潛、皇甫冉、呂溫、可朋、竇群、牟融、李廓、薛逢、方乾、鄭嵎、魚玄機、李洞、鄭遨、崔致遠、胡曾、徐寅、孟賓于等過去很少觸及甚至沒有觸及的小家也開始了研究。如翟傳增〈鄭遨及其創作〉(《河南大學學報》1997.5), 吳在慶〈關於方乾生平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97.4), 湯華泉〈劉珂生平事考辨〉(《古籍研究》1995.4) 等。在研究類型上, 從傳統的詩文和唐五代詞研究擴大至唐賦和駢文甚至戲曲研究, 如俞紀東的《漢唐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 1999.12), 霍松林〈論唐人小賦〉(《文學遺產》1997.1), 許結〈論唐代賦學的歷史形態〉(《南京大學學報》1996.1), 曹明綱〈唐代律賦的形成、發展和程式特點〉(《學術研究》1994.4), 莫道才〈駢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廣西師大學報》1990.4), 譚勇民〈唐宋戲曲理論四題芻議〉(《桂林教育學院學報》1990.3) 等。小說方面也不只注目於傳奇、國史、筆記、軼事、志怪等體類的作家作品研究, 總體特徵和流變史的研究也已經開始, 如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 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的內涵及特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995.2) 等。敦煌研究也從雲謠曲子詞、敦煌變文擴展至敦煌賦、唐詩寫卷、壁畫故事及語言學方面的研究, 如《敦煌賦校注》, 《敦煌文書校讀研究》, 《敦煌音義匯考》, 伏俊連〈試談敦煌俗賦的體制和審美價值〉(《敦煌研究》1997.3), 〈敦煌賦校校〉(《敦煌研究》1995.3) 等。文學理論方面也不再只注意詩歌理論, 詩韻、詩式、詩格研究在這一時期的成果更特別引人注目, 如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張少康〈皎然《詩式》版本新議〉

(《國學研究》1994.2), 曹大中〈齊己《風騷旨格》十體臆說〉(《益陽師專學報》1995.1) 等, 有關《二十四詩品》作者的真偽之爭更是人們關注的論題。

橫向拓展的另一種內涵是指涵蓋面為廣泛, 更注意整體的、宏觀的把握, 更注意一種歷史文化的橫向思考和人文精神的總體探究, 這是更為重要的一種橫向拓展。余恕誠的《唐詩風貌》(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1998 年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時改為《唐詩風貌及文化底蘊》) 即是成功的一例。這部論著所討論的實際上是兩個方面問題:

一是唐詩的總體風貌以及各個階段的風格特徵; 二是形成這種特徵的唐詩本身及外部諸因素, 其中談到的民族精神變遷和地域文化差異, 強調了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 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也似不及此論深刻, 因而彌足珍貴。類似的論著還有尚永亮的《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科舉之路與仕宦生涯——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0), 趙克堯〈盛唐氣象論〉(《復旦學報》1991.7), 孫昌武〈唐詩與文化積淀〉(《天津社會科學》1994), 劉尊明、王兆鵬〈本世紀唐宋詞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學學報》1999.5), 胡濤〈大唐風度——唐代文人心態與詩境〉等。

所謂縱向深入包括文本研究的深入和研究層面的深入。以文本研究而言, 無論是研究角度, 還是作家群類研究、體派研究、時段研究, 都在向縱深發展。就群類研究中, 關注的目光不僅在「初唐四傑」、「吳中四士」、「文章四友」、「大歷十才子」、「韓柳古文」等熟知的詩文作家群的進一步探討上, 對過去很少注意甚至沒有注意的詩人群體, 如初唐宮廷詩人群、貶謫詩人、縣尉詩人、唐末香艷詩人、襄陽詩人群落、湖州文人集團、大歷時期江南地方官詩人群落、晚唐兩大詩人群落等也開始做一些發掘、開拓性工作, 如君占華〈大歷浙東和湖州文人集團的形成和詩歌創作〉(《文學遺產》2000.4), 考察了大歷時期以鮑防、嚴維為代表的浙東文人集團和以顏真卿、皎然為代表的湖州文人集團形成、特徵和在文學發展中的作用。類似的還有尚永亮的《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3), 余恕誠的〈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其風貌特徵〉(《安徽師大學報》1996.2), 張亞萍〈唐代縣尉詩人創作特色初探〉(《華僑大學學報》1996.3) 葛曉音〈論宮廷文人在初唐



詩歌藝術發展中的作用》(《遼寧大學學報》1990.4)，戚清〈論唐末詩派的形成和特徵——以咸通十哲為例〉、劉寧〈論唐末香艷詩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 2000.10)，賈晉華〈《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同前)等。體派研究也有著和群類研究類似的特徵，不但山水田園詩派、新樂府詩派和邊塞詩派、韓孟詩派這唐詩中的四大流派有更充分的研究，一些過去沒有觸及或很少論及的中小詩派，如初唐宮廷詩派、上官體、沈宋體、潤州詩派、吳中詩派、咸通十哲、元和體、賈姚體、晚唐三十六體、吳富體等近年也開始研究和探討，並出現了總論方面的專著和專論，如許總的《唐詩體派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和孫映達〈唐詩流派評匯異論〉(《徐州師大學報》1997.2)。類似的論著還有胡可先〈吳富體考論〉(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 2000.10)，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遼寧出版社 1993)，鍾優民《新樂府詩派》(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7)，賈晉華〈論韓孟集團〉，李中華〈晚唐「三十體」辨說〉(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 2000.10)，杜曉勤〈從永明體到沈宋體〉(《唐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趙昌平〈上官體及其歷史承擔〉(《文學史》第 1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陳鐵民〈論律詩定型於初唐諸學士〉，林心治〈歌行的基本含義及由來——唐歌行體論之一〉(《渝州大學學報》1996.4)等。時段研究方面既有唐代文學各種體裁如唐詩、唐人小說、唐代散文的分段分期研究，也有重要作家的分期分時段研究。如杜曉勤的論文〈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和專著《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 1996)，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中心〉(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0)，陳友冰〈傳統的背叛與詩美的創新——淺論中晚唐險怪詩風的流變〉(臺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7.3)等。作家的分時段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家王維、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隱等人的研究上，而且往往和地域文化結合起來。如對李白的分期、分段研究，鄭修平《李白在山東論叢》(山東友誼出版社 1991)和武秀主編的《李白在荊州》(山東友誼出版社 1995)等。另外，陳均〈李白出蜀年代新考〉(《人文雜誌》1990.2)，郁賢皓〈李白與玉真公主過從新探〉(《文學遺產》1994.1)，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鐵道師院學報》1997.2)則分別對李白某一時段的活動提

出新說。如將王維一生劃為前後兩個時期，以及認為前後期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格，「是一種誤解」。作者以王維青年時代寫的《桃源行》為例，說明王維在青年時代就有別於建功立業型的知識分子，其後期的淡雅歸隱正是他貫穿於一生的價值追求的必然結果。類似的論著還有荊立民〈王維心靈歷程再探和前後分期說質疑〉(《東岳論叢》1994.4)，華寶魁〈王維安史之亂「受僞職」考辨〉(《遼寧大學學報》1998.2)，陳鐵民〈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4)，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跡新探〉等。

就研究層面而言，開始把關注的焦點由外在轉向內質：在作家研究上，由對作家生活時代、生平事跡、創作內容和風格的描述，轉入作家心靈世界的探尋，探討其創作的內因、情感變化和心路歷程。如近年來對李商隱無題詩的研究，就多著重於心靈的探索，如王蒙的〈混沌的心靈場——談李商隱無題詩的結構〉(《文學遺產》1995.3)，余恕誠〈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文學遺產》1997.2)，梁佛根〈義山詩的用典心理動因與中國詩用典的文化內因淺說〉(《河池師專學報》1994.1)，董乃斌的《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等。

五、唐詩學論著增多

1988 年，陳伯海出了本《唐詩學引論》，目的就是「突出地把問題提出來，喚起人們的注意」。進入九十年代後一批唐詩學方面的專著和論文紛紛面世，如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鷺江出版社 1996)，朱易安的《唐詩學史論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陳良遠〈論唐代詩選家的審美鑒賞批評〉(《陰山學刊》1995.2)，王遠熙〈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文學遺產》1993.5)，孫敏強〈從「比興」到「興象」——漢唐詩學形象理論發展軌跡試譯〉(《溫州師院學報》1991.4)，裴斐〈略論兩宋杜詩學中存在的一種傾向〉(《湖北大學學報》1995.3)，陶文鵬〈20 世紀前半葉的唐詩研究〉(《湖北大學學報》1995.5)，胡明〈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5.2)，陳友冰〈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評論》2000.6)等，從此唐詩學研究形成了氣候。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唐詩學研究出現了以下新的特徵：



一是有了理論上的建構和操作方面的整體思考。陳伯海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唐詩學引論》（東方出版社 1988）中曾首次對這一新學科的內涵進行系統地考察。到了九十年代，他在八十年代實踐的基礎上，又對唐詩學建構提出了整體的設想和具體的實施步驟：第一步先採集收錄有關唐詩學的書目文獻，摸清「家底」；第二步循書目對歷代評論唐詩的資料進行整理，分類成幾種資料性的書；第三步進行唐詩學的理論建構。³ 目前大概進行到第二階段，陳氏主編的《唐詩書錄》（齊魯書社 1989），《唐詩評論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全唐詩匯評》（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以及專著《唐詩學引論》（東方出版社 1988）俱已出版，其《唐詩學史稿》尚在撰寫之中。朱易安的〈唐詩學史論稿〉、黃炳輝〈唐詩學歷史回顧和走向預測〉（《廈門大學學報》1996.1）等也都在進行唐詩學理論建構上的整體思考。

二是唐詩學資料整理涵蓋面更為博大，往往是多位學者通力合作而成。陳伯海主持的「唐詩學系列研究」包括《唐詩學引論》、《唐詩書錄》、《唐詩評論類編》、《全唐詩匯評》四個子項目，共 400 多萬字，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華東師大、上海師大、上海教育學院、湘潭大學的近 20 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周勛初的《唐詩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更是集結了 80 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全書共設辭條 6200 餘條，其中詩人條目 3900 條，比清編《全唐詩》的作者多出 1700 人，這當中還不包括在選目中剔除的《全唐詩》中誤收和濫收者。張忠綱在二十世紀結束時出版的《全唐詩大辭典》（語文出版社 2000）更體現了大型、全面這一特徵。全書共收唐詩作者、作品以及有關著作方面條目 28,000 餘條，而且將百年來的唐詩研究專著作了提要，為了解和研究唐詩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三是一些大家如杜甫、韓愈等等學術史研究開展得較為充分。如杜詩學研究，九十年代以來，在杜甫對前人的承續、杜詩的流傳和對後世的影響、歷代杜集版本研究、杜詩研究史和杜詩學概論等方面，比起八十年代，皆有長足的進展。其中對杜甫繼承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屈原、陶淵明、二謝和庾信的繼承方面，唐代則多探討與陳子昂和杜審言的關係，代表性的論文有胡

曉明〈從儒家思想論屈陶杜蘇的相通境界〉（《安徽師大學報》1997.1），黃坤〈陶杜異同論〉（《文學遺產》1991.3），莫礪鋒〈論李杜對二謝山水詩的因革〉（《杜甫研究論集》）等。在杜詩的流傳和對後世的影響方面，有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考論〉（《文學遺產》1991.3）、〈杜詩在至德、大歷間的流傳和影響〉（《陝西師大學報》1991.3），許總〈明清杜詩學概觀〉（《杜詩學發微》南京出版社 1989），周興陸〈金聖嘆杜詩批解的文學批評學透視〉（《文學遺產》1998.3），熊智〈王夫之論杜評說〉（《杜甫研究學刊》1991.3）等。對宋代杜集的整理和杜甫詩話的輯校則有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和張忠綱《杜甫詩話校注五種》（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4）。在九十年代後期，有的論文開始探討杜甫詩歌在海外的流傳和影響，如劉楠〈杜甫詩風對朝鮮詩人的影響〉（《文史雜誌》1998.1），左江〈朝鮮李植《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底本辨析〉（《杜甫研究學刊》1997.3）等。

四是對近百年的唐代文學研究給予較多的關注並開始總結。近百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無論是研究道路之曲折，研究者精神之堅韌，研究觀念變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樣和研究成果之豐碩，都堪稱空前，而大陸近二十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更是近百年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期。研究總結近百年來唐詩研究狀況的有：文學遺產編輯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編的《百年學科沉思錄——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論文有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2），徐公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進程略論〉（《中國社會科學》1998.2），董乃斌等〈史料、視角、方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產》1998.4），郭英德、過常寶〈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歷程〉（《北京師大學報》1992.2），葛景春〈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中州學刊》2000.1），陶敏〈二十世紀唐代文學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5），陳尚君〈唐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3 〈唐詩學系列研究介紹〉，《唐代文學研究年鑑》，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05。



《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 同前》，許總〈唐詩研究的世紀回顧〉（《東南大學學報》2000.3），劉學鍇〈本世紀李商隱研究述略〉（《文學評論》1998.1），王淑梅〈七十年來溫庭筠研究述略〉（《文教資料》1996.3），葛曉音〈唐代文學研究百年隨想——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國學》網站 2000.10.25）等。

六、唐代文學史的研究取得了進展

從八十年代後半期起，開始出現了唐代的斷代文學史和分類史，如，羅宗強的《隋唐五代文學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李從軍《唐代文學演變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楊海明的《唐宋詞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熊篤的《天寶文學編年史》（重慶出版社 1986），周嘯天《唐絕句史》（重慶出版社 1987）等。進入九十年代後，這類專著更多，有子景祥的《唐宋駢文史》（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1），趙謙《唐七律藝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羅宗強、郝世鋒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許總《唐詩史》（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4），楊世明《唐詩史》（重慶出版社 1996），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出版社 1997），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王遠熙、揚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木齋《唐宋詞流變史》（京華出版社 1997），傅璇琮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 1998）等。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學史研究出現以下幾個特徵：

一是有較充分的理論思考和相互探討。八十年代也產生過幾部有影響的斷代文學史和分體文學史專著和若干有分量的論文，但基本上停留在實踐階段，九十年代在此基礎上開始了理論的思考，並產生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一些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文學遺產》、《文學評論》、《江海學刊》等皆為此開設過專欄或組織

過研討會。⁴ 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編寫文學史的體會，對此發表不少有識之見。如王兆鵬〈關於文學史的思考〉（《江海學刊》1998.3），袁行霈〈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5）等。

二是有的學者對此有系統的和長遠的準備，在作家、作品研究和時段、流派研究中注意其承續和流變，先用系列的單篇論文方式逐步反映其研究成果，然後在此基礎上綜合和重構。余恕誠繼《唐詩風貌》對唐詩橫向剖析之後，又開始對唐詩發展進行縱向尋繹，近兩年陸續發表有〈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風貌特徵〉（《安徽師大學報》1996.2），〈初唐詩壇的建設與期待〉（《文學遺產》1996.5），〈從李白到李商隱〉（《中國李白研究》1998.10），〈詩歌：從韓愈到李商隱——兼談文學演進中的穿透和位移現象〉（《文學遺產》1999.4），葛曉音自 1990 年出版的《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之後，又在從初盛唐入手研究唐詩的流變，發表有〈初唐四傑與齊梁詩風〉（《求索》1990.3），〈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文學遺產》1997.5），〈論天寶至大歷間詩歌藝術的漸變〉（《文學史》第 2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盛唐文儒道形成與復古思潮之濫觴〉（《文學遺產》1998.6）等，企圖理出一條從初唐到盛中唐的唐詩流變規律。

三是出現了以流派、流變、藝術風格等內在特徵為劃分標誌的文學史。如劉揚忠的《唐宋詞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出版社 1997），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木齋《唐宋詞流變史》（京華出版社 1997），趙謙《唐七律藝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等。

七、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層次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在深入到作家內心，注意其心靈歷程的同時，將研究領域延伸到史學、美學、文化學、經濟、藝術、哲學、神學、民俗等領域。對作家的評價，在充分佔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儘可能地調整視角，力求得出接近歷史本來面目的結論；對作品的理解，也超越了語言的詮釋和文藝學的鑒賞，擴展到民

4 如：《文學遺產》1993 年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 年 4 月 15 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組織的對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江海學刊》於 1994 年「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研討會」和 1997 年召開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



俗、社會學等方面。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已開始向這方面的嘗試，到了九十年代就運用得較為普遍，較為成熟。這當中，運用的較為成功的要數與文化、民俗、史學及宗教的結合上。

（一）與史學、文化學和民俗的結合

與文化學結合的如李浩的《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從地域文化觀念出發，對與唐代文學發展有關連的關中士族史事和關中地域文化進行考論和詮釋，並在此基礎上為唐代的關中文學定位，及對牛李黨爭、蘇綽的文體改革作出新解。亦是強調了地域文化在唐詩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這方面的論著還有黃去非〈杜甫入湘早期行踪及詩作編年〉（《雲夢學刊》2000.4），傅紹良的《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葛景春的《李白與唐代文化》（臺灣群玉堂出版公司 1991），陳選公的〈唐代文學的文化規定〉（《鄭州大學學報》1996.1），霍松林、傅紹良《盛唐文學的文化透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張伯偉〈中國古代詩論的文化考察〉（《中國詩學研究》遼海出版社 2000），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3），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 1997）等。

與史學結合的如戴偉華的方鎮、使府與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唐代幕府與文學》（現代出版社 1990），《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廣西師大出版社 1998），《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等。《唐代幕府與文學》是對唐代文人入幕這一獨特的時代現象作宏觀考察。《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則是在《唐代幕府與文學》的基礎上，從各類史書、文集、筆記、金石著作中將唐代節度使、觀察使府中的文職僚佐一一稽出，並儘可能加以系年，計得 2,500 餘人，近 4,000 人次。

（二）佛教與唐詩研究的結合

同八十年代討論佛學熱相比，九十年代有所收斂和冷卻，但也似乎更專深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研究特徵一是表現為寬泛性，有即是著眼於佛教與整個中國文學或中國文化的關係，這當然與當時的時代風氣有關；另一是多為佛教與唐代作家、作品的關係研究。九十年代的佛教與唐詩研究出現了以下幾個變化：一是在佛教與作

家作品的關係研究方面，研究者已不再滿足於揭示作家思想上有哪些宗教情緒，他們在其作品中又有哪些反映。而是開始探究佛學或禪宗思想對其創作產生哪些穿透，使其創作傾向如何發生位移；在作家思想上儒、釋、道是如何互動及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下的不同表現，並著重於整體的把握和深層的思考。其代表文章有閻琦的〈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係之探討〉（《鐵道師院學報》1997.3）。陳允吉的〈王維輞川〈華子岡〉詩佛家「飛鳥」喻〉（《文學遺產》1998.2）等；二是研究的範圍有所拓展，從佛教與作家作品間的關係拓展為同一個時代、一個時段、一種詩歌範式、一個詩歌流派、一種文學運動、文學思潮的關係，如孫昌武〈唐代文人的維摩信仰〉（《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郭紹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陳允吉〈牛鬼蛇神與中唐韓孟盧李詩的荒誕意象〉（《復旦學報》1996.3）等。三是對唐代詩僧和禪文學的研究開始鋪開和深入。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日、港、臺曾掀起一股持續多年的「寒山熱」，大陸在沉寂了多年以後於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了對寒山詩的研究。錢學烈的專著《寒山拾得詩校評》對寒山詩進行了全面的考證輯佚，陳耀東的〈徵引、擬作、賡和——寒山子「熱」考〉（《唐代文學研究》第 6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和王慶雲的〈論寒山詩及其在東西方的影響〉（《煙臺師院學報》1990.1）則分別從內和國外角度研究寒山詩接受史。孫映達的〈寒山子思想真相〉和嚴振非〈寒山子身世考〉（《東南文化》1994.2）則對這位詩僧撲朔迷離的生平作出新考。

（三）道教與唐詩研究的結合

八十年代這方面的論文較少，九十年代除了在數量上大量增加外，研究視角和研究手段上也有所拓展和變化。

一是繼續道教對唐詩的影響研究，但比起八十年代研究面有所擴大，也有所深入。黃世中的道家研究從八十年代論李商隱與道家關係擴大到整個唐代詩人和詩風，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論唐人山水詩的道意〉（《益陽師專學報》1994.1），〈論唐代道蘊詩的審美情感〉（《溫州師院學報》1994.5），〈論唐代詩人的崇道狂迷〉（《唐代文學研究》第 8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等。二是從八十年代的影響研究移到對道士、女冠詩和

游仙詩之類作品的研究。如梁超然的〈魚玄機考略〉（《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葛兆光〈道教與唐代詩歌的語言〉（《清華大學學報》1995.4），蔣寅〈吳筠：道士詩人與道教詩〉，李乃龍的〈唐代遊仙詩若干特質〉（《陝西師大學報》1998.3）、〈道教上清派與晚唐遊仙詩〉（《陝西師大學報》1999.4），李永平〈遊仙詩死亡再生母題〉（《陝西師大學報》1997.4）等；三是道教典籍和道教活動等本體研究開始起步。如葛兆光〈「神授天書」與「不立文字」——佛教與道教語言傳統及其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文學遺產》1998.1），汪泛舟〈敦煌道教詩歌補論〉（《敦煌研究》1998.4）等。

（四）唐詩與音樂、舞蹈及繪畫關係研究

唐代文學與音樂的關係研究過去多集中在詞源和詞體方面，如程杰〈論詞所體現唐代音樂精神〉（《學術研究》1987.6），周延良〈隋唐燕樂與詞的關係〉（《文藝研究》1996.2）等，但近年來從詩歌的角度多了起來。如朱易安的《唐詩與音樂》（瀋江出版社1996）、〈細故末節論唐音〉（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1990），李楊〈唐代音樂詩的文化解讀〉（《東方叢刊》1995.2），張志烈〈杜甫詩文中的音樂世界〉（《杜甫研究學刊》1998.4），葛景春〈李白詩歌與盛唐音樂〉（《文學遺產》1995.3），鄧惠明〈唐代音樂詩審美價值分析〉（《西藏大學學報》1998.2）等。

唐詩與舞蹈的關係研究，有張明非的專著《唐詩與舞蹈》（瀋江出版社1996）之外，論文〈唐代樂舞詩的藝術成就〉（《廣西師大學報》1994.3），趙文潤〈隋唐時期西域樂舞在中原傳播〉（《陝西師大學報》1997.1），耿占軍〈《唐代舞蹈》關於「燕樂」流變正誤〉（《唐都學刊》1997.1），劉陽〈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中國比較文學》1996.2）等。

唐詩與繪畫的關係仍多集中在王維詩歌「詩中有畫」的探討上。九十年代更有一批論著開始從總體角度來探討唐詩與繪畫的關係如王啓興〈唐代詩人與繪畫〉（《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陶文鵬〈傳神肖貌，詩畫交融——論唐詩對唐代人物畫的借鑒吸收〉（《文學評論》1994.6）、〈論李賀詩歌的色彩表現藝術〉（《文學評論》1997.6）等。

八、研究手段的多樣化

九十年代對西方新研究方法的引進在態度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從引進者來說，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進、囫圇吞棗、生搬硬套；也不再對此焦慮困惑、感到無所適從，而是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廣闊而深厚的背景，去尋求與此相契合的表達體系。從批評者來說，儘管一部分學者仍持八十年代以來的否定態度，但多數學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種平常心和寬容的精神來對待。九十年代運用較受關注的是比較研究、美學、心理分析方法和地域文學和家族研究法第幾種新的研究方法。

（一）比較研究

這是使用較多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也最多。西方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類研究在此時段的唐代文學研究中皆有使用；有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比較，如唐人傳奇與六朝志怪、宋元話本的比較，盛唐與中晚唐詩風比較，唐代古文運動與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比較，杜甫與白居易樂府詩的比較，韋應物、柳宗元五言古詩的比較等；有同一時代風格相近的作家作品間的比較，如高適、岑參邊塞詩的比較，元白比較、韓孟比較等；也有不同國家但風格相近的詩人詩作比較，如李賀與波特萊爾、長恨歌與歡喜國王緣之間的比較等。九十年代後期更多地出現了不同創作群體和不同文學體式間這種範圍寬泛的比較。如楊義的《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胡遂的〈論唐宋詞創作旨趣的發展演變〉（《文學遺產》1999.3），程國賦〈唐傳奇於元雜劇相關作品比較〉（《學術研究》1997.2），張思齊的〈白居易閑適詩與基督教聖詩比較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10），房日晰《唐詩比較論》（三秦出版社1998）等。

（二）美學、心理分析方法

這也是運用的比較多的兩種方法。進行心理學方面探討的有：如孟修祥的《謫仙詩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董乃斌《李商隱心靈世界》，許總〈文化心理坐標上的王維〉（《東南大學學報》1999.1.2）、〈論韓孟詩派的主體心性的強化與藝術表現的變異〉（《浙江東岳論叢》1997.1），屈光《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意識流》（《中國社會科學》2000.5），余恕誠〈變奏與心源——韓詩大變



唐詩的若干剖析》(《江淮論壇》1990.3), 陳友冰〈論李賀的抑鬱氣質與躁動心態〉(《江淮論壇》1993.3)等。美學方面的論著更多, 而且往往與心理學研究相結合, 從審美心理角度加以探究, 如盧燕平《唐代詩人的審美心理》(敦煌文藝出版社 1991), 張瑞君〈大歷詩歌的理學和美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4.9), 喬力〈詩之餘——論中唐文士詞的文化品位與審美特徵〉(《文學評論》1995.4), 尙永亮〈山水的個體幽怨與美學追求——論柳宗元記遊詩文的直接象徵性和間接表現性〉(《文學遺產》2000.3), 李浩《唐詩美學》(陝西教育出版社 1992)、《唐詩的美學闡釋》(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0), 申秀雲、趙顯慶《唐宋詩詞美學》(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8), 陳允鋒《唐詩美學意味》(新華出版社 1999),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索》(華文出版社 2000)等。

(三) 地域文學和家族研究法

這是目前較受關注的研究方法, 它源於丹納的地域文學與詩人群體理論但又有很大的變化, 特別是地域文學研究, 九十年代出現了相當數量的論著, 如李浩《唐代文學與關中士族》(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運用地域、家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對唐代關中地域文化和關中士族的史實進行了辨別和梳理, 對當地地域文學的發生機制進行了新詮釋, 在此基礎上唐代關中文學進行定位。鄧志方的《浙東唐詩之路》則是部很獨特的從地域文化來研究唐詩的專著。著者以浙東剡溪為主幹, 把這條古旅遊線上的 14 個景點, 與有關的 207 首唐詩加以比較, 並附有大量實證資料, 以探求當年浙東唱和的地點、成員、規模和特色。類似的從地域和家族角度進行研究的還有趙昌平的〈吳中詩派和中唐詩歌〉, 臧清〈論唐末詩派的形成和特徵——以咸通十哲為例〉, 賈晉華〈《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 2000.10)等。

在現代化研究手段的運用上, 一部分古代文學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研究者), 對電腦系統的操作, 網上資訊的使用已由陌生轉為漸漸熟悉, 而且隊伍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展。在二十世紀結束前, 北京大學編製了「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 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唐宋金元明詞資料庫」; 東南大學的曹濟平、朱崇才在〈詞學研究的新工具和新方法〉中, 對建立「詞學研究電腦專家系統」進行了構想, 並進行了初步的嘗試, 將《全

宋詞》和《詞話叢編》輸入電腦, 並建立了相應的檢系統和數據庫。另外, 世界上最大的古籍資料光盤《中國基本古籍庫光盤》也正在編輯之中, 該光盤共 500 張, 囊括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所有基本要籍, 預計在 2004 年可以問世。全國和省市一些重點大學的中文系和研究中心, 也都有自己的網站, 目前的問題是網上資料不多, 有的還在編目或進行全文、文摘的數位化處理, 要真正發揮網路作用, 當有待時日。儘管包括唐代文學研究在內的古典文學研究在軟件開發和網路工程等現代研究手段方面, 還遠遠落後於信息技術的正在迅猛發展的時代, 甚至也落後於相鄰學科。

參● 結論

九十年代的大陸唐代文學研究也還存在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和一些不足之處。從整個學科體系來看, 雖然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 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學科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從價值評判標準來說, 它搖擺於政治倫理的附庸和表達個人性靈之間而無法確定自己的真正位置; 從研究方法來說, 古代文學研究不是依賴(或者說是借用)經學的訓詁注疏和史學的知人論世等研究手段, 就是套用西方的理論框架, 沒有自己明確的理論領域。這樣就導致了具體研究方向上的爭論和搖擺: 例如如何看待目前的文獻學研究成果? 如何處理文獻學和文藝學研究之間的關係? 在文獻學研究中如何處理一流大家和中小家研究之間的關係? 在文藝學研究中如何評估社會歷史方式的研究以及目前大陸一些學者大力提倡尋心靈研究, 兩者的位置究竟應該如何擺正? 這反映在文學史編寫上, 是要強調「史」——撰寫文學史應當具有史學的思維方式, 還是打破只注重文學外部條件的「詩——史範式」, 寫成「心靈史」? 是以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傳統模式, 還是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

從古典文學及研究者的社會位置來看, 大陸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 現實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的迅速轉換, 使古代文學研究在現實生活中逐漸失去自己的位置, 愈來愈難以用現有的方式與社會溝通, 這又導致了一些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產生兩種偏向: 有的是趨時, 或是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不願意下那



種既消耗時間又費力氣的輯佚、箋注、考辨等基础性扎實功夫，甚至在普及類讀本中連八十年代的那種賞析文字也不願多寫，僅選些詩文，加幾句評語就匆匆推出。或是在學術研究和學術爭論中搞商業炒作，動輒「在某研究領域重大突破」、「填補了某某空白」；有的是「避世」，不去和現代生活溝通，在介入現代生活、體現當代人文關懷去實現自我價值，而是與現代社會疏離，從而導致對自身的否定。

就唐代文學的研究對象來看，發展也不夠均衡，研究中還有一些死角和弱項：就文體而言，唐詩、唐五代詞較為充分，對散文、賦研究不夠，尤其是唐代散文，與唐文的創作數量和創作隊伍很不相稱，也遜於臺灣當代唐文研究。就某種類型的研究而言，發展也不均衡，如歷代唐詩學研究，有的時段研究比較集中、比較深透，有的時段則比較薄弱，甚至沒有觸及，如對唐人的唐詩選本，宋代和清代唐詩學術尤其是杜詩學的研究要充分一些，金元明的唐詩學研究就較少，除了少數幾篇論元好問、楊慎、胡應麟、胡震亨的唐詩學反杜詩學研究外，其餘諸家幾乎未觸及。宋代杜詩學研究雖較充

分，但也還沒有看到像臺灣學者蔡瑜「宋代唐詩學」（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0）那樣對唐詩學的總論。另外，對歷代唐詩總集、大家的別集整理研究得多一些，相比之下，小家資料的匯集，歷代關於唐詩的時段、流派、群體研究卻顯得沉寂。道教與唐詩研究，對道家詩人及女冠詩的研究剛剛開始；對唐代遊仙詩、煉丹詩、送宮人入道詩、葵花詩、仙道類小說的研究有的剛起步，有的還未觸及；對道藏、道曲的研究和從中梳理出唐詩、唐人行踪，也似未見有成果問世；至於一些道教活動和道教儀式對社會包括對作家生活、創作和心靈的影響，不同的道教流派對詩人及詩人群落的不同詩風形成的影響研究，是很少觸及。至少還沒有看到像臺灣學者李豐楙等對道理出一條道教與文學互動的關係史。唐詩與音樂、舞蹈及繪畫關係研究多為單一性研究，有的雖是專著，但多為一般性的介紹，缺乏深入的探討。至於系列的論著，群體式的關注和集中式的討論，似乎未形成氣候。至於像臺灣學者沈冬《唐代樂舞新論》那種專論，也還有待於將來。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 4-2 種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

本目錄係漢學研究中心委託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鄭阿財教授、嘉義師範學院朱鳳玉教授主編。

全書蒐集西元 1908-1997 年間，海峽兩岸及東亞地區學者之敦煌學研究成果，並且旁及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目錄。共收錄敦煌學研究的專著、期刊論文、論文集篇目、學位論文及報紙論文等約一萬二千筆。內容編排分為：目錄、總論、歷史地理、社會、法制經濟類、語言文字、文學、經子典籍、宗教、藝術、科技及綜述等十二類，每類之中又分作若干子目，儘可能依內容性質以類相從，並按時間先後為序。資料豐富而廣泛，對研究相關主題之學者，當可發揮極大的助益。民國 89 年 4 月出版。臺灣地區定價新臺幣 700 元，其他地區定價美金 35 元。（含郵資）。